

萨米尔·阿明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路

周思成 译

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给本刊发来两篇文章《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和《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备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害的南方国家和欧盟应该采取怎样新的发展道路。由于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相关,本刊以《萨米尔·阿明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路》为题一并发表如下。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目前遭到了当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战。

第一次挑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阵营和“共产极权主义”阵营。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杀掉了:由于它的“非共产主义”性质,它被径直划归“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认为只适用于资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现实则被完全地漠视了。次年,日丹诺夫在他的(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著名报告中——正是这个报告导致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简化形式)的成立——也将当时的世界一分

为二,即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报告忽视了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投身解放斗争的外围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对立。

日丹诺夫教条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抚美国及其欧、日盟友的敌对情绪。作为交换,苏联将保持低姿态,不再干预帝国主义列强视为自身内部事务的殖民地问题。于是,当时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得到任何的积极支持,只能自谋出路。不过,它们取得的胜利——当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莫斯科直到万隆会议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凭借万隆会议的影响,苏联才得以通过支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国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一跃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第一次“南方国家的觉醒”造成了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

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诺夫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几乎立即就遭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的抵制。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当时使用的主流话语之中,因为它们仍然继续肯定苏联背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亚洲和中东各国重新争取独

立的斗争的发展，特别在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这种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人撰写过替代理论的形成历史，这种替代理论后来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中得到明确，并体现在了不结盟运动（自 1960 年起包括亚非国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挥亚非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理论形成史的相关细节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产党（包括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文献中。

不过，在 1950 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士组成的反思团体，这使我能够亲眼见证发生的事件。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 1963 年，我们才通过王同志（王是《革命》杂志的联络员，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国由周恩来引发的争论。我们也听到在印度发生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分裂的一些消息，这次分裂后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得到了证实。我们还了解到印尼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基于同一路线产生的争论。

这部替代理论的形成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万隆会议并非像某些当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样，肇源于那些民族主义领袖（尤其是尼赫鲁和苏哈托，也许还包括纳赛尔）的思考。实际上，它是当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激进的左派批判的产物。这些反思团体获得的共同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在世界范围内团结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取得的胜利可能对当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进步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上述结论仍然留下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未能解决：谁来“指挥”这些反帝战役？更明确地说，是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时称“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共产主义者而非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是反民族的）领导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来指挥反帝战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 1945 年，

各国的共产党以斯大林的结论为基础结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在当时习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把“民族的旗帜踩在了脚下”（斯大林语），而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团结那些不向帝国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秩序低头的力量，形成统一阵线。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只是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于 1952 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点。毛认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众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只能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当时的习惯用语）的革命来开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虑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进步；只有当外国国家人民已经给帝国主义造成实质性破坏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进步才能形成气候。

中国革命的胜利肯定了这一结论。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在越南模式的激励下开始了解放斗争。随后，在 1964 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呼吁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越南”。

关于独立的和反帝的“亚非国家”的主动权的前瞻建议是由不同的共产主义反思团体提出的，也是明确的和进步的。这些建议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纲领中均有体现，对这些纲要，我已经在《南方觉醒》（L'éveil du Sud）中作出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重新夺取对积累过程的控制权（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发展）作为根本需要。

1955 年到 1960 年间，这些建议的确一度曾被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政策在亚非大陆推行，不过其力度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东南亚所有的共产党发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当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枯竭。苏联在决定支持

不结盟阵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帝国主义三套(美、欧、日)则公开对之宣战了。

相关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随后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卷入了痛苦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冲突。一些人汲取教训,认为“支援”那些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势力是必要的,虽然这种支援必须坚持其“批判”立场。莫斯科通过创造出“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论题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其他共产主义者则坚持了毛主义的精髓,认为只有由独立于资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组成的阵线,才能成功地领导反帝斗争。官方虽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冲突发端于1960年,但实际上这一冲突自1957年起就已经表面化了。当然,这一冲突也证实了在亚非共产主义者内第二种路线的存在。

然而,万隆运动的潜力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就逐渐耗竭,这一事实突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的局限性。由此,帝国主义反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将南方经济“再买办化”,如果不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再殖民地化的话。

然而,一些南方国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经被认同为“新兴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和明显地无能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万隆运动不过是冷战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要问,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新兴”?这种“新兴”是向来自帝国主义三套车的垄断资本的扩张开放的新兴市场?还是有能力对全球化实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垄断寡头权力的“新兴国家”?对那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外围国家)的权力本身的社会含义,以及它们所开放或关闭的前景的疑问,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显的。但

是,即便是在进入由2008年金融崩溃发端的新阶段之前,人民就已经开始从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摆脱出来,这种萎靡不振是随着上一次工人和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衰退而开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与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万隆时代并未发挥影响力,但现在似乎走在了运动的前列。

尽管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现象,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着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的问题:南方(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掌握独立的战略主动权吗?民众力量能够对力量体系施加变革吗?这种变革是通向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进步之间架起桥梁吗?

对这些难题,我不想仓促作出答复,它们只能留待斗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应竭力解决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则不容低估,由此产生的那些讨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如此。

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反思团体所得出的结论,使用了与过去本质上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挑战:外围国家的人民应该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由区域的和作为整体的南方的计划来支撑),这种建设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除非它们的斗争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进行,它们是无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外围国家必须摆脱它们对下面这种错误选择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赶超”。万隆运动虽然也包含了这种独立选择权,但是却带有后来为历史所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觉醒”方兴未艾之时,结果是否会更好?首先,当前能否团结起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的斗争?令人痛惜的是,在万隆时代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中心的人民最终还是团结在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领袖身后。事实上,如果没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会的帝国主义

租金,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规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仅仅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的一个插曲,甚至也许还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在北方,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亚非国家发起的第一次解放运动浪潮的实质。即便如此,运动的力度本身还是使得莫斯科对它施以援手。

构建一个反帝的工人和大众的国际主义的事业仍需努力。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一个国家及其货币,都是集体资本超越单个资本的各种竞争力量进行运作的手段。时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市场控制而无需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仅剩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职能)的见解,完全不以任何对于资本的严肃的历史理解为根据。这种见解同样也缺乏任何能证明市场可以维持最优均衡的科学理论为基础。

欧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欧洲国家的时刻诞生的,民族国家自身被剥脱了管理资本的职责。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货币的定义,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政治意义上,“欧洲”是不存在的。尽管存在着对超国家主权的幻想,事实上却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在任何一个单独成员国国内,都不存在接受一个由“欧洲大选”中诞生出的欧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政治成熟。目前,人们还只能对这样的设想心存期待,而欧洲的真实合法性的实现为期尚远。

从经济和社会方面看,欧洲就更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目前,这个拥有25到30个成员国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着该区域经济的垄断寡头,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决于它们的大股东的民族性的团体。这些团体首先属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其次属于荷

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和部分南欧地区与北欧及中欧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还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垄断寡头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体。这一形势,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导致在欧洲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社保和税收体制,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欧洲体系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2. 因此,欧元的创立原是本末倒置。虽然其创始者们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宣称这一设想本是打算迫使欧洲建立一个跨国国家,从而在事实上扭转本末倒置的局面。这样一个荒谬的体系只有在总体经济形势持续有利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吃惊。一旦危机(最初表现为金融危机)开始冲击该体系,欧元就变得无法维持,对于如何有效和连贯地作出反应,人们也束手无策。

欧洲的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对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及其他)的反应也是荒谬和徒劳的。这些反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面紧缩。这与1929—1930年间各国政府的反应极为相似。正是这些反应在上世纪30年代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今天,我们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译者注)也将看到同样的后果。

3. 在上世纪90年代真正应该做的是建立“欧洲货币蛇体制”;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拥有货币主权,在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的限度内,依据自身的时机和需要来管理其经济和货币。这种货币“蛇体制”将通过固定(或相对固定)汇率确保各国的联动,而汇率则能够通过协商而予以适时的升值和贬值。

在这一设想之下,对于“硬化蛇”(stiffening serpent)的长期观点将是现实的——也许会导致放弃谋求一种共同货币。这一进程将由生产体系、真实工资和社会福利

的渐进收敛过程来调节。换句话说,通过自下而上的收敛,“货币蛇”将帮助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但是,这将要求各国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展现控制金融泛滥的政治决心。这与以去管制的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荒谬的现行体系截然相反。

4. 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可靠的货币赖以维持的途径,并代之以与现实时机相适应的、对受危机影响的各国都有效的货币“蛇体系”。

希腊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如下决策开始这一进程:(1)“暂时”与欧元脱钩;(2)将它们的货币贬值;(3)至少就金融流动而言,要实施外汇管制。通过实施上述措施,这些国家将能够在一个坚实的立场上通过协商谈判重新确定其债务表,并在通过审计后要求取消那些与腐败和投机(这些属于外国垄断寡头参与并趁机发财的活动!)相关的债务。我确信,这将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5.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出路的实现机会是极其渺茫的。决定维持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欧元,并在“金融市场法则”的神圣性面前五体投地,这些并非某种荒谬理论的结果。它们意在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它们是构建一个欧洲集体的关键要素,后者本身就将排除一切针对垄断寡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题为《帕潘德里欧致默克尔的公开信》的文章中,这封代言式书信的希腊作者将德国过去与现在的专横傲慢做了比较。在20世纪,德国的统治阶级曾两次图谋通过战争手段创造一个屈服于他们意志的欧洲统一体,但两次均以失败告终。他们对欧洲领导权和统治一个“马克区”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对德国经济的过高估计,德国经济实际上只是相对强大而实际上是脆弱的。

只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

机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经说过,欧洲要么是左派的欧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当前欧洲的左派势力的战斗口号仍然是“当下的欧洲总比没有欧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在其现行形式下,这个体系将导致史无前例的混乱。所有的设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们讳莫如深的极右翼的复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被阉割了的欧洲或欧洲的完全崩溃,都是无所谓的。一个团结的强大的欧洲将迫使美国在意其利益和观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6. 我已经尽力在本文中做到简明扼要,避免重复我此前在下列著作中就欧洲僵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著作是: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ap 6 1997.

L' hégémonie des Etats-Unis et l' effacement du Projet européen, Section II, 2000

Obsolescent Capitalism, Chap 6 2003 original French 2002

The Liberal Virus, Chapter V, 2003 F 2002

Beyond US Hegemony, Chapter VI 2006

The World We Wish to See, Chap 3 2008

Fram Capitalism to Civilization, Chapter VI 2008

La crise, 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 chapitre I 2008. ■

[周思成: 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丁海)